

当代文学史研究丛书
程光炜 主编

『重写』 的限度 『重写文学史』 的想象和实践

杨庆祥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当代文学史研究丛书
程光炜 主编

『重写』 的限度

『重写文学史』的想象和实践

杨庆祥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写”的限度:“重写文学史”的想象和实践/杨庆祥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5

(当代文学史研究丛书)

ISBN 978-7-301-18818-7

I. ①重… II. ①杨…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史-研究
IV. ①I20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71057 号

书 名:“重写”的限度——“重写文学史”的想象和实践

著作责任者:杨庆祥 著

责任编辑:张雅秋

封面设计:奇文云海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18818-7/I · 2336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pkuwsz@yahoo.com.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2

印 刷 者:三河市富华印装厂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650mm × 980 16 开本 17 印张 237 千字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4.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当代文学史研究丛书”总序

从1949年全国第一次文代会算起,中国当代文学的建史和研究,已经足足60年。在中国历史上,这60年是社会最为动荡又充满历史机遇的一个年代。但放在一百七十多年来的视野里,人们并不会为它离奇、剧烈、丰富的故事而惊诧。“当代文学”就发生在我们共同记忆的这一历史时段中。在当代文学史研究中,我们无法无视历史的存在将文学看做一个“纯文学”的现象,我们也无法摆脱文学与历史的无数纠缠,将作为研究者的自己置身事外。明白了这一点,就能懂得中国当代文学学科为何迄今为止都没有像中国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那样建立学术的自足性、规范性,反而屡屡地被人误解和贬低。更容易看清楚的是,如果当代史观到今天还没有在幅员辽阔的大地上成为一种“社会共识”,那它势必会不断动摇与该史观息息相关的当代文学史的思想基础和学科基础。

当代文学史学科自律性一直缺乏的另一个原因,是它的下限始终无法确定。2000年后至今,当代作家的大量新作有如每年夏季长江无法控制的洪峰一样奔腾不息,声名显赫的老作家也不肯歇笔,对自己的思想头绪稍作整理,并对历史作更深远的瞭望。对新作的关注,仍然是最热门的事业。这就使当代文学很多从业者不得不放弃寂寞的研究,转入更为丰富多彩的当代文学批评之中。当代文学批评在慷慨为文学史研究提供新鲜视角和信息的同时,也在那里踩踏涂抹着“文学批评”、“文学理论”与“文学史研究”的界限。著名作家的新作,还会冲刷、改写和颠覆当代文学以往历史的价值,“超越”依然是当代文学批

评最动人的词汇,正是它造成了当代文学观念的不断的撕裂。这种情况下,当代文学的标准和研究规范经常被挪动,也就不难理解。

本丛书提倡从切实材料出发,以具体问题为对象,对当代文学史的“史观”展开讨论,据此观察中国当代文学史为什么会以这种方式展开,影响文学思潮、流派、文学批评和作家创作的历史因素究竟是什么。将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我们就能逐渐知道,它的研究在中国学术环境中失败的症结之所在。

本丛书主张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历史化”。认为先划出一定历史研究范围,如“17年文学”、“80年代文学”等等也许是有必要的,它会有利于研究问题的分层、凝聚和逐步的展开。对具体历史的研究,可能比宏篇大论更有益于问题的细致洞察,强化研究者对自身问题的反省,所谓的历史化也只能这样进行。

本丛书不收文学批评论集,而专以文学史研究为特色。丛书作者以国内一线学者为主,但不排斥年轻新秀优秀著作的加入,更欢迎海外学者的加盟。既为文学史研究丛书,自然希望研究者以经过沉淀的、深思熟虑的文学现象为对象,不做简单和草率的判断;它强调充分尊重已有的成果,希望丛书的风格具有包容性,也主张收入本丛书的著作对不同于自己观点的研究拥有包容性。

本丛书是对60年来当代文学史研究多次努力的又一次开始,这是一项长期和耐心的工作。它并不奢望自己的出版能改变什么,但也相信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前途并不糟糕。

程光炜

2011年3月2日于北京

在今天语境中再看“文学史重写”问题(代序)

程光炜

杨庆祥的新著《“重写”的限度》即将出版,值得为他高兴。从他到中国人民大学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开始,我们相处了六年。前年又留校任教,我们成为同事。他应该是跟着我时间最长的学生之一。

杨庆祥原来写诗,我曾怀疑诗人能否成为一个学者。但今天看来,年轻时候有过文学创作的经验,对后来从事学术研究也大有裨益,假如我们把诗人身份隐藏在学术研究下面的话。文学创作,可以使人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和艺术感觉,而这两点恰恰是一个优秀的学者应该具备的条件。虽然不能说所有没有经过文学创作训练的研究者都会先天不足,事先跛足,但至少我们已经看到,一些人对自己所要研究的问题,对研究领域的了解和规划,确实是缺少敏锐观察力和没有目的性的。也可能是这个缘故(至少是之一吧),在我带过的二十多名博士生中,杨庆祥是少有的让我放心的学生之一。他平时寡言,但心中有数,头脑清晰,善于表达,从做硕士论文开始,就已经明白,什么是自己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而对不可以做的问题,又采取什么方式来加以弥补、调整,绕一个或几个弯子,再换另一种方式进入研究的问题之中。杨庆祥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在《文艺研究》、《文艺争鸣》、《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等重要杂志发表了很多有分量的学术论文,其中有的还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并获得《南方文坛》2007年度“优秀论文奖”。其中一些文章,已经受到人们的相当注意,有的观点还被其他大

学的博士生硕士生论文引用,这对一个刚刚毕业工作的研究者来说,已属不易。

19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使“文革”后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脱胎换骨,完全进入另一条历史轨道,现当代文学学科因此重新洗牌。但遗憾的是,20多年来一直没有人认真清理反思过这一重大的学术思潮,就连当年的发难者都没做过任何工作。这是我当年建议杨庆祥做它的研究的主要理由之一。对这一本来就具理论强势、自信满满的学术思潮,应该采取怎样一种重新进入的方式,用怎样一种研究角度与之对话,关系著作整体的成败。我们当时的设想,一是采取强势的理论对话,用高屋建瓴和事先预设的理论姿态,将这一思潮先设定为几个历史立足点、知识点,在一种整体性的架构中讨论它的意义和问题;二是以“讲故事”的手段,把北京和上海作为故事的骨架,通过叙述串联“重写文学史”的发生、发展和学界反应,它的历史延伸及其对整个现当代文学学科产生的冲击效应,等等,从中理出一条可讨论的历史线索。杨庆祥的这部新著,采用的正是后一种方式,根据历史线索向纵深深入,在此基础上建立自己学术研究的逻辑关系、历史根据和学理自足性。

重新讨论“重写文学史”思潮,显然是因为我们今天所处的历史语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与它连带在一起的还有制度环境、知识结构、学科建设等等。在这种完全不同的文化环境下开展对它的研究,不仅是研究者,即使是似乎已成历史纪念碑的“重写”思潮,也都在发生某种历史位置的挪动。另外更重要的是,“重写文学史”思潮已是25年前的故事,裹挟在那场思想解放运动和新启蒙浪潮中的“人与事”,或是已经退场,或是成为文学史博物馆里的馆藏。对像杨庆祥这样的“后代研究者”来说,它首先已经具备了一种“历史陌生化”的形象;其次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因为时间长久而产生的历史距离,研究者自己具备的历史深度、知识储备和评析眼光,也是能否形成问题意识并产生学术价值的前提条件。对于后代研究者来说,重温的过程是一个自我寻找的过程,同时也是一次自我整理的过程。他在研究问题时,会时时意识

到自己应该站在什么妥当的位置,建立怎样一种视野,使用怎样一种知识,他在与历史对话的时候,实际上正是这种“位置”、“视野”和“知识”与前者的对话,而并非书写者本人的全部历史行为和语言符号行为。

我们发现,杨庆祥通过“两个城”(北京、上海)之间的时空转换,通过对北京和上海两个学术群体历史动机、认识装置以及研究者身份的重新认知,已经对多年前的那场思潮做了重新布局。这种布局,如果能够被更多学界人士所接受的话,也许会成为历史时期人们对该思潮的接受视角和想象形式。我注意到,杨庆祥一改他过去善于在讨论中推进问题的方式,采用从第一手文献资料中梳理问题的方法,甚至有在某些部分大量铺排这些资料的嫌疑。他这样做,无非是倾向于把“重写”思潮置放在更为结实的历史基础之上,而不像有些热衷于思想的研究者,更愿意在事先准备好的框架里填充问题,包括填充作家作品。我欣赏这种工作方式。因为我从来都觉得,所谓文学史研究,实际是对历史文献的仔细整理和研究,是那种“论从史出”,而非“史从论出”的工作方式。这种方式不一定好看,但具有生命力,尤其是当某些新潮理论和批评再次因年代转折、历史震荡而遭人诟病并被遗弃的时候,这种老老实实的工作方式,才始终活在我们的书斋之中,每天与我们相处,并不时给我们带来历史生命的欣喜。

至于这部书稿,我不愿给予过多的评论。因为我从来都相信,没有任何人的序言能够左右读者对问题的判断,即使鉴于某种特殊时代氛围,它可以影响一时,但却不能左右长久。杨庆祥的新著就是他近年来工作的最有力的证明。而当我写完这篇短序的时候,我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这部新著的旁观者。我像许多希望了解它的历史纹理和问题储存的读者一样,更愿意自己坐下来,在阅读中走近作者,并与他一起享受思考和写作的快乐。

目 录

在今天语境中再看“文学史重写”问题(代序)	程光炜(1)
绪 论 如何理解“重写文学史”的“历史性”	(1)
一 “重写文学史”的当下性和文化内涵	(1)
二 “重写文学史”与学科的重构	(5)
三 研究的对象、思路和方法	(9)
第一章 “从历史实际出发”和“重评”的分歧	(16)
一 从唐弢版《中国现代文学史》说起	(16)
二 “从历史实际出发”的“重评”	(32)
三 对“现代文学”理解的分歧	(44)
第二章 “20 世纪中国文学”和“去历史”叙事	(52)
一 “20 世纪中国文学”提出的几个背景	(53)
二 “现代化”与“去历史”叙事	(74)
第三章 上海的“重写”姿态和内涵	(94)
一 上海:“重写”的另一发生空间	(96)
二 “新潮批评”、“文学圈子”与“重写意识”	(107)
第四章 反思“重写文学史”:审美主义和主体意识	(121)
一 审美性和作品中心主义	(121)
二 叙事体式背后的主体意识	(132)
三 对“当代文学”的态度	(142)
结 语 重新解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153)

2 “重写”的限度

一 现代文学成为“古代文学”？	(155)
二 “文学研究”与“文学史研究”	(159)
三 “整体性”与“当下性”	(163)
四 现代文学研究的根本问题	(166)
附录一 “20 世纪中国文学”和 80 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	
——钱理群访谈录	(168)
附录二 历史视野中的“重写文学史”	
——王晓明答杨庆祥问	(193)
附录三 知识分子精神与“重写文学史”	
——陈思和访谈录	(219)
附录四 《上海文论》和“重写文学史”	
——毛时安访谈录	(234)
参考文献	(254)
后 记	(260)

绪 论 如何理解“重写文学史”的“历史性”

一 “重写文学史”的当下性和文化内涵

让我们从一个文化事件谈起。2000年,《收获》第2期“走近鲁迅”专栏刊发了三篇文章,分别是冯骥才的《鲁迅的功与过》、王朔的《我看鲁迅》、林语堂写于1937年的旧文《悼鲁迅》。这三篇文章虽然风格各异,重点不一,但都有一致之处,那就是对鲁迅的“经典形象”进行一种解构式“重写”。冯骥才开篇就点出鲁迅的“成功”之处在于“独特的文化的视角,即国民性批判”,但是随即笔锋一转,认为:“然而,我们必须看到,他的国民性批判源自一八四零年以来西方传教士那里。……可是,鲁迅在他那个时代,并没有看到西方人的国民性的分析里所埋伏的西方霸权的话语。……由于鲁迅所要解决的是中国自己的问题,不是西方的问题;他需要借助这种视角以反观自己,需要这种批判性,故而没有对西方的东方观做立体的思辨。……可是他那些非常出色的小说,却不自觉地把国民性话语中所包藏的西方中心主义严严实实地遮盖了。”^①王朔则直言“鲁迅的小说确实写的不错,但不是都好,没有一个作家的全部作品都好”,“鲁迅写小说有时是非常概念的,这在他那部备受推崇的《阿Q正传》中尤为明显”,“我认为鲁迅光靠一堆杂文几个短篇是立不住的,没听说有世界文豪只写过这点东西的”。^②林语堂

① 冯骥才:《鲁迅的功与过》,《收获》2000年第2期。

② 王朔:《我看鲁迅》,《收获》2000年第2期。

以同代人的身份对鲁迅的定位是：“鲁迅与其称为文人，无如号战士。战士者何？……不交锋则不乐，不披甲则不乐，即使无锋可交，无矛可持，拾一石子投狗，偶中，亦快然于胸中。此鲁迅之一副活形也。”^①这三篇文章一俟发表，立即在文化界引起很大反响，反对者有之，赞成者亦有之^②，但大多秉持某种道德化立场，真正有价值的观点并不多，所以有人指出：“从1999年底刮起的一股‘批鲁风’，实际上是1998年文坛‘断裂’事件的延伸和继续。如果不认真研究导致产生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并加以妥善解决，而单就鲁迅论鲁迅，那就会纠缠不清，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③那么，这一深层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联系到冯骥才的另外一篇文章，或许能看得更清楚一些。1993年，在一部分学者提出“后新时期文学”^④这一概念之际，冯

① 林语堂：《悼鲁迅》，《收获》2000年第2期。

② 2000年5月22日，浙江绍兴市政协委员、绍兴市作家协会主席朱振国以会员身份致函中国作家协会，对这三篇文章表示不满。朱振国认为：“概括《收获》上的三文，可以说冯骥才的开篇是‘点穴’，王朔卖点是‘抹粪’，林语堂压卷是‘漫画像’。”并质问：“读者迷惘的是：这次《收获》讨伐鲁迅，到底是出于怎样的考虑？作为我们协会主席和刊物主编的巴金知不知道这事？如果不知道，那么，这次‘倒鲁’是谁策划又代表了谁的旨意？用意何在？”文章结尾，朱振国要求《文艺报》刊出这封公开信并作出复示。朱振国的文章首先发表在《绍兴日报》，一些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如新华社发表了题为《贬损鲁迅引起作家朱振国质疑》的消息，《中国青年报》发表了题为“绍兴作协主席质问《收获》：贬损鲁迅，意欲何为”的消息。《收获》杂志的副主编肖元敏、程永新对朱的质疑作出了强烈反映，分别发表了《走近鲁迅，用心良苦》、《走近鲁迅，何错之有》的相关文章。中国作家协会并没有对朱振国的公开信公开表态，但是在6月10日出版的《文艺报》“作家论坛周刊”开辟了相关专栏，一是在“鲁迅是中国现代进步文化的代表”的大标题下发表了北京召开“鲁迅研究热点问题讨论会”的消息，题为《鲁迅的革命精神不容亵渎》，另外刊发了陈漱渝的访谈录，题为《要想跨越他，首先要继承他》。

③ 陈漱渝：《要想跨越他，首先要继承他》，《文艺报》2000年6月10日。

④ 1992年秋，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和《作家报》联合召开了“后新时期：走出80年代的中国文学”研讨会，这次会议将90年代文学命名为“后新时期文学”。与会者的文章分别发表在《当代作家评论》1992年第5期和《文艺争鸣》1992年第6期上。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言：“尽管对‘后新时期文学’的时间划分以及具体的内涵、特征有着不同的见解，但他们大多以‘市场化’、商品经济的消费性对文学的影响作为区分两个不同文学时期的前提。”（洪子诚主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北京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19页）

骥才发表了《一个时代结束了》^①一文,提出“新时期文学”已经成为一种“历史”,是到了“应该自我保存”的时候了。冯骥才列举的理由有四:第一,“新时期文学”已经完成了挣脱“文学为政治服务”的使命;第二,“新时期文学”已经完成了“文学回归自身”的使命;第三,“新时期文学”的读者群已经涣散;第四,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文学的使命、功能、方式,都需要重新思考和确立。从“走出80年代文学”到“新时期文学终结”,再到“批鲁风”,我们不难看出,这些文化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是90年代以来因中国社会转型而要求对80年代建构起来的文学史观念和文学经典进行再一次的重写。很明显,在冯骥才、王朔等人看来,要走出80年代文学(新时期文学)就必须走出鲁迅的神话,只有解构了鲁迅的神话才有可能解构80年代文学的神话。这里凸显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作为80年代文学的亲历者和参与者,冯骥才和王朔都非常敏锐地意识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80年文学”实际上是一种建立在对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启蒙文学”的激活和建构的基础之上,并最终确立了以启蒙为主导的现代化文学话语叙事。正如贺桂梅在其博士论文中所论述的:“80年代前中期,对五四传统的理解在思想文化界大体是一致的。批判传统的封建主义文化因素、倡导世界性文化眼光和肯定普遍意义上的‘人性’,都被看作是五四时代没有完成的现代文化建构工程,而在80年代得到继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80年代被看作是直接继承了五四传统,以推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的历史时期。”^②因此也可以这么说,冯骥才、王朔等人对鲁迅的批评,绝不仅仅是对作为单个作家的鲁迅的批评,而是对80年代以来所建构起来的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化文学话语的批评。在此我无意辩驳这一文化事件

① 冯骥才:《一个时代结束了》,《文学自由谈》1993年第3期。

② 贺桂梅:《80年代文学与五四传统》,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0年6月,未出版。

的是是非非^①，只是想指出一个问题，当冯骥才们试图“重写”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时候，与其说他们面对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史）这一历史的存在，不如说他们面对的是经过 80 年代“重写文学史”思潮建构起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这一话语的存在。实际上，90 年代以来的一系列文化事件，如“人文精神”大讨论、“断裂问卷事件”^②、经典大师排位^③、《收获》事件等等，他们的诸多话语方式、知识资源和行为逻辑都与 80 年代“重写文学史”思潮密切相关，“从某种角度看，这可以看作‘重写文学史’历史逻辑的延续”^④。它们一方面沿袭了“重写文学史”思潮的某些知识资源和行为方式，另一方面，又通过一种断裂的方式反证了 80 年代（包括“重写文学史”思潮）不仅是一种“过去时”的存在，更内在于我们当下的文化构成之中。这些当下的话语事件以后发的方式进一步凸显了 80 年代“重写文学史”思潮在应对、推动、型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话语时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它使我们意识到，在一个更开阔的历史视野和知识语境中回过头来重新审视 80 年代的“重写文学史”思潮，以及与此相关的文学（史）叙事，不仅是

① 在我看来，第一，冯、王虽然站在 90 年代的立场上对 80 年代的文学话语进行批评，但所使用的知识资源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来自于 80 年代，比如王朔对小说的非概念化、虚构本质的强调，实际上来自于 80 年代“新潮小说”的评价标准。第二，冯、王等在对 80 年代所建构起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话语进行批评的同时，一方面暴露了其中的一些问题，另外一方面也同时遮蔽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历史性。

② 1998 年，作家韩东、朱文等人发起一份旨在挑战现有文学秩序的“断裂”问卷，后来问卷和 56 位青年作家、评论家的答卷一起刊登在当年的《北京文学》第 10 期上。这份问卷由于问题设计很有针对性、倾向性和引导性，在当时的文坛引起很大的反响。参与者宣称要跟长期信守的道德观、价值观以及信仰、趣味断裂。题目包括“你认为中国作家协会这样的组织和机构对你的写作有切实帮助吗？你怎样评价它？”“你认为作为思想权威的鲁迅对当代中国文学有无指导意义？”“你对《读书》和《收获》杂志所代表的趣味和标榜的立场如何评价？”等。回收的问卷中，出现了这样的回答，“公共浴室（问题一）”、“让鲁迅歇一歇吧（问题二）”、“《读书》是特辟的一小块供知识分子集中手淫的地方，《收获》的平庸是典型的，一望而知的（问题三）”。

③ 1994 年，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一川主编《20 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在小说卷“排行榜”中入选金庸，而茅盾则落选。

④ 温儒敏、李宪瑜、贺桂梅、姜涛等：《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 1 月，第 129 页。

历史研究的需要,同时也是回答当下困扰我们的诸多文化问题的现实需要。

二 “重写文学史”与学科的重构

毋庸置疑,80年代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叙事与“重写文学史”思潮密切相关。首先,“重写文学史”思潮建构起了一种新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学科形态,正是在80年代“重写文学史”思潮的发生和展开过程中,一种完全不同于前此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被叙述和确立起来。经典作家谱系的更替大概最能见出这种变化的幅度,1951年,以陈涌为首的北大文学研究所主要从事现代重要作家的研究,他们首选的八位作家是:鲁迅、瞿秋白、郭沫若、茅盾、丁玲、巴金、老舍、赵树理。^①到了唐弢、严家炎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鲁迅、郭沫若、茅盾各单列一章,巴金、老舍、曹禺三人合为一章。^②到了1987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单列一章的经典作家是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沈从文、曹禺、赵树理。^③进入90年代以后,这种变化的幅度更大,樊骏根据《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发表的文章作了专门的统计,以1989年为界,前十年关于鲁、郭、茅、巴、老、曹的文章占了作家作品研究的半数以上,而近十年则缩减为四分之一;张爱玲、沈从文、萧红、林语堂、徐訏、冯至、穆旦的研究文章明显增多,有关闻一多、赵树

① 王瑶1951年5月8日致叔度的书信。见《王瑶全集》,卷八,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1951年出版的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是以文学体裁来进行章节划分,只有鲁迅的《呐喊》和《彷徨》、曹禺的《雷雨》被单列一节。见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海:文艺出版社,1954年3月重印。1956年出版的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以文学斗争为主要叙述对象,单列一章的作家只有鲁迅一人,单列一节的作家有瞿秋白、柔石、胡也频、殷夫四人。

② 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一卷、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6月、11月。唐弢、严家炎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12月。

③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王超冰:《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8月。

理、夏衍等人的文章显著减少。^①而且,不仅是经典的秩序被重写,即使是对于地位没有变化的经典作家,研究的角度也明显不同。以鲁迅为例,在80年代“重写文学史”思潮中,鲁迅从前此的革命的、无产阶级战士的、现实主义的鲁迅变成了一个启蒙的、现代主义的鲁迅,与此相关的是,以前遭到忽略的《野草》等作品获得高度的肯定和评价。再比如对沈从文和张爱玲的发现,也决然不仅仅意味着发掘或者“平反”一些被掩埋的作家作品,而是在这种经典谱系的更新中,蕴涵着一种新的文学史的评价标准和准入原则。正如王瑶所总结的:

针对长期以来存在的“以社会主义文学的标准衡量现代文学”的“左”的倾向,强调了现代文学的新民主主义性质,提出要以是否具有“反帝反封建”的倾向,以及这种倾向表现的是否深刻、鲜明作为衡量和评价现代文学作家作品的基本标准。……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人们逐渐发现“反帝反封建”的标准本身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人提出了“文学现代化”的概念。它包含了文学观念的现代化,作品思想内容的现代化,作家艺术思维、艺术感受方式的现代化,作品表现形式、手段的现代化,以及文学语言的现代化等多方面的意义,并且把作家作品的思想内容、倾向和艺术表现、形式统一为一个有机整体;应该说,它是把现代文学“反帝反封建”的思想特质包括在内,具有更大的包容性,揭示中国现代文学本质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的提出,是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又一次思想解放,它使我们研究工作的重点由注重现代文学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其他意识形态的共性转向了现代文学自身的个性。^②

① 樊骏:《〈丛刊〉:又一个十年(1989—1999)——兼及现代文学学科在此期间的若干变化(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2期。

② 王瑶:《关于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回顾和现状》,《王瑶全集》,卷五,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

在“重写文学史”思潮的推动下,区别于“政治标准”的“文学性标准”、“审美标准”逐步得到确立,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并重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性质。“我们首先在理论上明确了现代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它既属于文艺科学,又属于历史科学,它兼有文艺学和历史学两个方面的性质。”^①这种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性质的确认,直接影响到对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认识和研究:

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的学科建制或创建……包含了对“文学”基本观念的重新理解,以及新时期文学实践的性质等更为核心的问题。关键问题之一,是“当代文学”性质的变更。……其中发生的微妙变化,则是“十七年时期”处于“边缘”或“非主流”位置的文艺观点和作品,渐次地转为“主流”。……新的“主流”文学指示的方向,不仅扭转了“文革”时期趋于极端激进的革命文艺实践的路径,而且在《讲话》和“五四”的承接关系上也更接近后者。^②

也就是说,对当代文学学科性质的重建,是建立在对现代文学学科性质重建的基础之上的,这两者基本上是一种同构的关系。没有对现代文学学科的“五四性质”和“启蒙意义”的重新确认,就不可能把当代文学从“社会主义性质”中“抽离”出来,而这两个学科的重建则统一于80年代“重写文学史”的实践中。

80年代“重写文学史”思潮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面目,同时也直接影响到80年代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对于严家炎来说,对“新感觉派”的发现和重评与80年代初对“现代派文学”的讨论密切相关;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寻根文学”的兴起为所谓的“文化角度”提供了创作上的支持,而反过来,“文化角度”作为一个区

① 王瑶:《关于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回顾和现状》,《王瑶全集》,卷五,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

② 温儒敏、李宪瑜、贺桂梅、姜涛等:《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第155页。